



序一

献给我的父母亲、大姐与黎雅格

1、关于《萝卜回来了》

我与叶俊良先生初次见面是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上,当时他把新作《我在法国做图画书》(台湾玉山社,2017年)送给我。之前在香港召开的丰子恺图画书奖评委会上,台湾的柯倩华女士说有一位勇敢的台湾人在法国开了一家童书出版社,使我很好奇,没想到真的有机会见到了他。在回东京的飞机上,我兴致勃勃地翻开了叶先生的大作,周翔、余丽琼、朱成梁……我多年的老朋友和同行们的名字不断跃入眼帘,又让我倍感亲切。后来,我真正与叶先生有了来往,是他找到我,说想在法国出版图画书《萝卜回来了》,希望我为他介绍作家方轶群的遗属。

叶先生的热心和彬彬有礼使我感到他是真心想做好书的人,而不是那种时而会遇到的出版投机



商，我当然愿意帮他这个忙。

说起来话长，这部作品最早是松居直先生在法国发现的，那时日本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方轶群作，村山知义画的《亲切的朋友》（日文书名）1965年由福音馆书店月刊《儿童之友》出版。村山知义是把欧洲现代文化介绍到日本的著名文化全才，兼剧作家、画家、小说家、导演、舞台美术家、建筑家、舞蹈家为一身，而且酷爱中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多次率日本进步文化界人士访华，与周恩来总理很熟悉，后来周总理还亲自安排他的家属来中国长期居住治病。这也是村山知义画的第一本图画书，我也有幸与村山一家长期亲密交往。

1986年，我随松居直先生去上海拜访方轶群先生。方先生在黄浦江的游船上亲口为我们讲述了《萝卜回来了》的创作过程。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作为祖国亲人慰问团的一员前往前线看望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听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慰问团送给一个连队一箱饼干和糖果，这个连队的官兵想到别的战友也许更需要，就转送给另一个连队，最后转来转去这些礼物又转回来了。方先生深受感动，就用拟人化的动物形象为孩子写出了这个故事，他当时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

松居直先生和我第一次听作家亲口讲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都大吃一惊，又兴奋不已，没想到这个受到无数孩子喜爱的温馨故事竟来源于残酷的战场！当时，我们都流出了眼泪。

回到日本后，1987年我们出版了这部作品的图画书单行本。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在日本几乎没有不知道这本书的小朋友，这是一本“黄金畅销书”。我一直与方轶群先生直接联系，处理有关出版的事宜，直到他2007年去世后，又与他的儿子方炯先生交往。两年前，他们得知我快退休了，担心今后联系不畅，办理了一次性版权手续，我也安心卸

下了这副光荣的担子。可以预见，这部中国人写的作品会在日本长久流传下去。

正因为有这些经历，所以当我得知叶先生要通过我找到方轶群先生遗属，办理正规的版权手续，由法国人作画，在法国正式出版时，别提有多高兴了！这部灵感来自朝鲜战场，深受小朋友喜爱的中国作品，经由日本，又通过旅法的叶先生的辛勤劳动，由华人办的出版社带给欧洲的小朋友，这是多么奇妙，又多么令人赞叹的文化交流啊！这种交流本身，就反映出童书的真谛——孩子的真善美世界里，不应存在国界。

2、中华文明与世界

这次，叶俊良先生的《我在法国做图画书》即将出版中文简体字版，实属可喜可庆！策划此书的柳漾先生约我写点什么，我想他主要考虑到我与叶先生有些相似之处吧。我生长在北京，1983年偶遇松居直进入福音馆，成为日本出版界的第一个来自外国的“正社员”编辑。说起来，出版是每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文化顶端，容忍外国人大显身手的空间很小。即使到现在，不论哪个国家，类似的情况也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和叶先生同属“深入虎穴”“孤军奋战”吧。

拜读叶先生的大作，使我产生许多共鸣。他三十八岁创办出版社，我三十岁进入福音馆，都属于半路出家。他是学建筑的，我是学音乐和媒体的，起步时都没有做童书的经验。我用日语工作，他用法语工作，都不是母语。我们曾经的困惑和失落感很相似。所以，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收获的果实，得到的喜悦，心中的成就感也是双倍的。

叶先生的书使我再一次思考，什么是文化？其实，养育每个人的家乡、水土、习俗、家庭、幼儿园、学校等形成的“文化”，是一个人的根基，



是他的“名片”，是他难以改变的“命根子”。拥有中国文化，或是东方文化背景的人生活在外国，就是我和叶先生面临的世界。

我们身处异国，首先想到能做的事情——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文化、东方的智慧。但是，其实纵观历史可以得知，中国文化绝非孤立形成的，而是吸收兼并了各民族、各国的优秀文化而发展壮大的。我和叶先生的工作是出版童书，而童书不似其他行业，光靠打“中国文化牌”是行不通的。因为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国籍没有过多意义，不是挑选图书的主要选项，孩子的喜爱和追求不在这里。那么，我们想向外国人介绍和推广中国文化的“初心”必然会遇到障碍。

我非常欣赏叶先生的一段话：“我成立鸿飞出版社之后也没有想着要向别人证明什么，只是为了生存而不断地求进步，并探究让法国多一家童书出版社的理由：鸿飞可以带给读者什么？值得他花时间读，同时是别的出版社无法做到的？”

我欣喜地看到，叶先生摸索出的道路是“自由”，是“融合”，是“多元”，他的编辑工作超越了国界，超越了种族。他说：“这个世界不论去到哪里，爱表现的人似乎总是比较多，耐心听别人说话的人相对少一些。我在法国住了二十多年，不想多听也不行，因为法国人很直接坦诚，爱发表意见、自我表现。我就把它当作学习的机会。台湾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有很高的热忱但还未有足够的时间做沉淀，这是转变中的年轻社会不可避免的过程吧。至于中国大陆，我尽力而为，耐心等待回馈。”

关于叶俊良先生的努力，他的经验和工作细节，我就不赘述了，读者可从他的书中得知，并得到许多启发。叶先生给我写的信中说：“经过十三年的努力，我们给作者和读者的印象是不仅能做好原创书，而且是少数懂得如何编辑、出版华人创作者作品的法国出版社。东方人文精

神在鸿飞书目里不是猎奇的对象，而是和西方创作平起平坐的人类精神资产。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对自我的期许。”

我想，这段话非常好地总结了他把中华文明融入世界的奋斗历程。



序二

2015年我担任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评委，在那么多书里，我看到了《花木兰》。

它是一本法文书，当我翻开时，就被里面的画和气息所吸引。在佩服画家的同时，我更佩服这本书的编辑，因为书里每一个结构、每一页设计，无不透出编辑的匠心。通过画面空间结构所表达的精神和力量，把花木兰这个传统故事演绎得这么具有现代意味和浪漫感，让我惊叹，而这种演绎无疑让这个故事绽放出了新的生命。我毫不犹豫地为一本书投了选票。评委们共同讨论时，许多国外评委也给予这本书很高的评价，当然，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本书是叶俊良先生编辑的。

后来在上海，俊良来领奖，我遇到了他。他是一个谦虚、温和的人，谈到图画书，他的眼睛就更亮。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私下喊他学霸，

因为他从小到大，永远都是第一名，从来没做过第二名。他学过物理，也学过建筑，当过建筑设计师，又修过文学，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全才。他转到出版时，又是那么自然，他把一本书当作建筑来做，与其他人不一样，他编的书里有一种建筑空间感，这种空间感让书充满了力量和浪漫感。这是其他编辑所不能做到的。这一点我非常羡慕。

再后来我到他法国的工作室去做客，我们谈图画书，我们一起去参观书店，一起坐在卢瓦尔河边聊天，这种心灵的交往，让我们彼此都很舒服。我们无话不谈，也憧憬未来，对中法图书，甚至对中法文化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对我们做书有很大的帮助。也许俊良在法国待久了，使得他既有东方人的含蓄，也有西方人的直率：他观点犀利，但不失真诚；他做的书讲究大气，比如《团圆》法文版，是所有海外版里我最喜欢的版本。只要看到封面的红色，就让人感觉一股暖流溢满胸怀。那是我从没见过的红色，那微妙的色度是需要极专业的眼光才能做得出来的，俊良一定下了很大的功夫，这是他做事的特点。

俊良和合伙人黎雅格在法国创办了鸿飞出版社，做了这么多好书，在法国童书界拿了那么多奖，得到了众多法国读者的好评，这是极不容易的事。他并不仅仅是为法国读者在做书，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重视书里的东方情韵，他想把东方的美好与西方人分享，搭建一座东西方互通的文化桥梁。而这又是非常难以构建的，弄不好很可能不三不四，既不像东方又不像西方。但俊良是心灵的建筑师，他精心选择了包括《孔子》《花木兰》在内的许多故事，再用东方故事的思想，和法国人浪漫的艺术表达，将东西方文化很巧妙地融合在书的结构中。他用法国人独特细腻的感受，表达中国传奇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也显现了一个优秀编辑把控一本书的功力。这种中西融合、内外兼修的艺术表达，不仅西方



人喜欢，从西方回到东方时，也受东方人欢迎。

我知道，在法国做图画书不容易，毕竟俊良是东方人，在法国生活的环境与他从小所生长的环境都不一样，要在法国竞争这么激烈的图书市场上获得肯定，必须要有过人的才华与智慧，这种艰辛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凡尔赛宫的建筑和中国园林建筑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思想不一样，建筑成果也不一样，中国园林是曲径通幽，而国外是开门见山，一览无余。俊良将这些建筑理念都运用到了他的书里，使他所做的图书都有了独特的纸上建筑的味道。想要呈现的生命结构、情感体验、艺术的韵味，都在里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对俊良怀有深深的敬意，我也在他身上学到了以严谨的态度工作，以及将书作为艺术品来对待的专业精神。

俊良在生活中是一个极守规则的人，我们在法国时，记得有一次晚上出去，我和同事们见没有人，就走到大马路上，回头一看，俊良依然规规矩矩地走在人行道上，这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俊良对朋友很真诚，他话不多，但细心，会把很多事替你做了，但你并不察觉。他替我们找旅馆，策划行程，找好吃的东西，生怕我们受到委屈，这样的情意，我都记在心里。我和俊良经常通信，彼此交流做书、做出版的心得。他喊我周大哥，这让我很受用。作为大哥，我从内心祝福他，希望他的出版事业做得更好，也希望他的书在中国受到欢迎，我也期待着与他再见面。

前言

我从远方来， 为了让繁花盛开

我在法国成立鸿飞文化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到现在已经十六年。在成立童书出版社之前，我在巴黎维尔曼建筑学院取得学位，也与一位法国建筑师一起工作过。而在来到法国学习建筑之前，我在台湾出生，求学，长大。所以我是一个来自台湾，拥有建筑专业背景，与法国人一起做童书的编辑。

2013年底，台湾玉山社魏淑贞主编来到巴黎东郊的蒙特勒伊童书展开幕晚会，我们在鸿飞的展位上第一次见面，魏主编当场建议我把从台湾来法国定居与创业的过程写成一本书。

一开始我想：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以写的素材很多，应该不是难事。但其实不然，原因有几个。第一，编辑需要处理甚多的信息与人际关系，一个好的编辑可以累积经验，持续精进，但几乎不见有人把这个复杂的心智与社交活动记录下来。这些思辨过程对我来说有如条件反射，但是会做不见得会解释，所谓“知难行易”。我必须想办法把它分解成若干基本“招式”，引领读者走进堂奥。第二，图书种类繁多，而我编



辑的作品大多具有“童书”和“跨文化”这两个特色，这些书的创作和阅读本身有其特殊的条件，我分享经验时应注意避免在不具代表性的案例上兜圈子，帮助读者透过一个具体视角窥探图书编辑的普遍法则。第三，相同的食材可以经由不同的厨师做成不一样的料理，相同的图文也可能经由两个编辑做成两本大异其趣的书。做书过程里大大小小的选择和判断并非来自偶然，而是与编辑个人的精神生活、历练和际遇相互穿透才形成的。一条贯穿了不同社会、文化与专业的人生路如何帮助我确定选题并增进与创作者和读者对话的能力，这也构成一个值得挖掘的面向。

写书的当下，我对上述的挑战只有模糊的概念。经过四年的探索和记录，《我在法国做图画书》于2017年底在台湾出版了。我感觉自己像是个埋首前行的人，在转身抬头的瞬间看见一段美好的来时路。有些细节可能解释得还不够清楚，有些比喻可能不是最贴切，但好歹留下了印迹，得了一个粗胚，日后如果要进行改善，不必从头来过。

书出版不到一个月，我在法国收到一位陌生人的来信：柳漾先生希望取得授权，在大陆地区出版。我第一个反应是问他：“您确定吗？”这几乎是一本为自己写的见证之书，现在有人不仅读懂了，还愿意把它分享给广大读者。这是我做梦也不敢奢想的福分。

鸿飞出版社服务法国作者和读者，虽然和中华文化有深厚渊源，与中国创作者的进一步互动却是近年的事。我们从2014年起陆续引进优秀原创中文图画书，包括《团圆》和《安的种子》，2015年因获得上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花木兰》而与评委周翔老师结缘，我也首次前往南京拜访朱成梁老师和余丽琼老师。与西方人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年的我，第一次有与精神上的家人重逢的感觉。随后我偶尔和国内有

志于从事出版或创作的年轻人交流，感受到一股旺盛的学习热忱与能量。柳漾先生了解我分享经验的初衷，为从远方来的我搭一座桥，开一扇门，实现我们共同的心愿，让此地繁花盛开。

中国和世界在各个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儿童图画故事书也不例外。不管是撷取国外优良作品的长处以滋养本土原创，还是将优秀华人原创推向海外，经过政府和民间有心人持之以恒努力，已经有很好的开始。但是接下来的路还很长，交流除了“海内存知己”的喜悦之外，也夹带了因语言文化差异而起误解的风险。当我们不为对方所理解，固然会产生挫折感，但它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学习机会：对方习惯而且喜欢的表达方式是什么？为什么他会这么看，这么想？说不定我的方式有偏狭欠缺的地方？我是不是应该尝试不同的看事情的方式？分享的乐趣让我们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看世界，他不见得错，我不见得对。我们先虚心倾听，对方或早或晚也会理解听的人并非完全没有想法，于是反过来听我们分享。不论是在童书出版还是其他领域，对易位思考的重视与实践，是我们给下一代最好的示范和礼物。

与我合作过的法国作家和插画家，以及关心并支持鸿飞的法国朋友们全都看不懂这一本用中文写的书，而华文读者也大多不能无碍地进入我编过的法文童书的世界。但，这是一本不能不写的书。我把它献给所有的小孩与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小孩的大人：不管他们身在何处，讲哪一种语言，我祝福他们共享一篇篇动人的故事，携手创造一个理解胜过偏见、可以自由去来的开放的世界。

叶俊良

二〇二三年九月三十日